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晚清史学科
晚清史论丛（第六辑）



清末新政与边疆新政（上册）

Reforms and the New Frontier Polici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
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编

卷外借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 · 晚清史学科
晚清史论丛（第六辑）



清末新政与边疆新政（上册）

Reforms and the New Frontier Polici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
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 编

上册

早期全球化背景下清代多民族帝国的大一统话语重构

——以《皇朝文献通考》若干问题为中心 …………… [美] 赵刚 / 1

介绍西方学术界的新政改革研究状况 …………… [美] 麦金农 / 45

“在乎山水之间”

——《清史·地理志》审改札记 …………… 姜涛 / 54

从民间传说看近代中国穆斯林的皇帝观

——以《回回原来》为中心 …………… [日] 山崎典子 / 68

清廷国史《章学诚传》的编纂：章氏学说实际境遇之补证 …… 戚学民 / 79

长生、济世及一统：郑观应与近代道教 …………… 马平安 / 88

清末边疆危机应对与边疆观念变化 …………… 郭丽萍 / 114

晚清变革中史学观念的变化 …………… 刘俐娜 / 127

1901~1905年清末政治改革述论 …………… 崔志海 / 150

清末法制习惯调查再探讨

——基于清末新政预备立宪脉络的历史梳理 …………… 邱志红 / 167

“乙全本”不是“李汪宪草” …………… 彭剑 / 193

汪荣宝与资政院速开国会案	章 博 / 210
伍廷芳与中国法律近代化	张礼恒 / 233
清末铁良南下再研究	彭贺超 / 244
清末革命团体和秘密会党	
——以同盟会武装起义为主	〔韩〕李平秀 / 269
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学术史认知	段金生 / 307
略论同光之际铁路问题的复杂性	熊月之 / 332
地方性外交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以东三省总督锡良铁路交涉为例	马陵合 / 354
张荫桓与英德续借款	马忠文 / 387

下 册

光宣之交清理财政前夕的设局与派官	刘增合 / 403
清末各省财政监理官人员考	任智勇 / 421
A Coin for China? Emergent Nationalism,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Minting Silver Coins in the Guangxu Period (1887 - 1899)	〔美〕Austin Dean / 451
晚清北京的学堂创办与白话报	
——以宗室女教育家继识一和葆淑舫郡主为例	〔日〕阿部由美子 / 487
道光帝与旗人书院	顾建娣 / 497
光绪癸卯年经济特科考述	张海荣 / 504
袁世凯与地方统治、官员教育	
——以法政学堂与日本人教习为中心	〔日〕水盛凉一 / 538
浅论清末新政对上海近代法学教育的推动	袁 哲 / 558
光绪朝泰州单毓年以荷据爪哇之施政于治藏方略之考量	朱悦梅 / 569
联豫奏请裁撤驻藏帮办大臣改设左右参赞的动机与背景	朱恩泽 / 587
晚清新政与滇东南土司	范德伟 / 603
凤全“筹边新政”与晚清川边统治	李德英 张 杨 / 614

承前启后：锡良督川时期筹贍川属考	潘 崇 / 630
晚清东三省巡边制度研究	王宏斌 / 647
清末新政时期东三省治蒙机构的新置	詹 夺 / 665
关于袁世凯与东三省改制的几个问题	廖大伟 张 昊 / 674
局部与整体：清末蒙古王公贡桑诺尔布的改革及其历史意涵	廖大伟 张华明 / 686
清末“开蒙智”探微 ——以代表性蒙旗为中心	柳岳武 / 699
升允与清末陕甘新政	张华腾 / 727
清末新政期间在宁夏采取的措施	张天政 / 741
逆势的博弈 ——西北危局与秦州独立	严斌林 / 756
后 记	/ 769

早期全球化背景下清代多民族 帝国的大一统话语重构

——以《皇朝文献通考》若干问题为中心

[美] 赵 刚*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恐怕很少有比大一统观念更耳熟能详的政治理念了。从周秦之际出现起，它就成为中国历代精英追求的政治梦想。以笔者非常初步的观察，大一统思想主要围绕三个要素展开。其一是大一统理想，也就是相信“天下归一”，只有把人们所能想象到的世界，亦即所谓的天下，纳入儒家设计的政治和文化秩序之中，才能建立理想社会。其二是完成统一后，明确其直接统辖的范围和间接或名义上统治的范围，按照传统的观点，前者是疆域的范围，而后者是四夷的范围。其三是大一统话语，每个王朝建立后，都要根据新的条件，建构新的话语，说明改朝换代的正当性，解释为何只有自己建立的统治，才是真正的大一统理想的实现，是正宗的儒家大一统治世之道。这种话语建构的方法之一，就是纂修各类综合性史书、政书、一统志。它们彼此尽管内容体例千差万别，但有几项内容却是共同的。一要有天文方面的内容，证明新秩序得到天命的“背书”；二要列举皇朝管辖的四境八至、省府州县，展示开疆拓土之功。^①此外，按照“修文德以徠远人”的原则，没有“文德”则“远人”不来，“远人”来华的

* 赵刚，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① 如元代编《统同志》，也就是《大元大一统志》的前身，主要是“为理会地理，勾当数年，用工将古今书史传记所载天下地理建置、郡县沿革、事迹源泉、山川人物及圣贤赋咏等，分类编述，自成一书，取汉书王吉所云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名其书曰《统同志》，上以发扬圣朝混一海宇之盛”。《秘书监志》，“四库全书本”，第6~7页。

数量、次数和规模就成为皇朝“文德”的体现；^① 为了充分体现皇朝的“文德”无远弗届，这些史书、政书、一统志等三项必备的内容，就是有关所谓四夷的论述，记述其他国家的地理、历史及其与中国的朝贡关系。^② 不过，每个王朝所处的环境，所统辖的疆域，所面临的问题，乃至于是所能给出的答案都不尽相同。他们各自虽然都从这三个方面着手来建构大一统话语，其中的内容却因王朝时代的不同，而有或多或少的差异。这些文献也因此成为解历代大一统话语演变的理想切入点。

18世纪60~80年代，根据乾隆皇帝的旨意，清廷动用巨大的人力物力纂修了一系列展现盛世文治武功的典籍，其中之一就是《皇朝文献通考》，它是宋元之际历史学者马端临所著《文献通考》的续编，成书于乾隆五十年之后。^③ 正如该书凡例和各考引言所一再强调的那样，该书编纂的目的就是彰显清朝的“一统之盛”。^④ 作为《文献通考》的续编，《皇朝文献通考》沿用前者的体例，有关于天文的《象纬考》，记述清代截至乾隆时期的官方天文研究成果；有关于疆域的《舆地考》，叙述清代到乾隆中期的帝国疆域，其不仅包括清廷划定的内地十八省，而且还包括新疆、西藏、蒙古等地；^⑤ 还有关于四夷的《四裔考》，记述清代周边及与中国有来往的世界各国。这三“考”建构了新的大一统话语。它们尽管和马书相应部分有相同标题，但在一些有关大一统话语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如本文下面所指出的，与马著完全不同。这种差异本身是盛清时代根据新的现实、利用新的资源对大一统话语重构的产物。

本文不打算对《皇朝文献通考》中的《舆地考》《四裔考》《象纬

① 有关“修文德以徕远人”，详参罗志田《先秦五服制与古代的天下中国观》，《学人》第十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② 《皇朝文献通考·四裔考》就强调清朝“圣德”和四裔宾服的相辅相成，称“我国家一统函夏，四裔宾服，列圣经营，宅中取外，百余年来，圣教覃敷，梯航远至，……自非圣德洋溢，何克臻此？”（《皇朝文献通考》，第7413页）

③ 据乾隆五十年三礼馆的一份公文称，《皇朝文献通考·四裔考》纂修工作直到乾隆五十年尚未完成。原档藏（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登录号：117949-001（本文引自数位典藏与学习联合目录网公布的原件全文照片）。另外，《四裔考》六有乾隆五十年十月将私自进入内地传教的西方人吧也哩央押解出境的记述，这些都说明《皇朝文献通考》的成书当在乾隆五十年之后。

④ 如“凡例”强调“以类备陈，以见大一统之治云”，《舆地考》强调该考的编写是为了“昭大一统之盛”（十通本，商务印书馆，1935，第4847、7263页）。

⑤ 《皇朝文献通考·舆地考》已经使用了“十八省”的概念，称“京师盛京而外，为省一十有八”（十通本，第7263页）。

考》作面面俱到的论述，只想在清代多民族帝国形成和早期全球化的背景下，对下列三个有关盛清大一统话语重构的问题作一初步的讨论。其一，《象纬考》为何要用经纬度取代分野？其二，《輿地考》为何要用“本朝之制”取代“九州”模式？其三，《四裔考》为何要采用朝贡互市两分的方式记述与中国交往的海外诸国？这些问题的讨论，不仅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视角检讨清代多民族帝国形成的历史、国内学界仍然盛行的闭关锁国论的得失，而且还可以从新的视角探讨早期全球化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

长期以来，学术界强调汉化对清代多民族帝国形成发展的贡献。西方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清史”对传统的汉化说提出了强烈批评，强调满洲认同的建构和维系对清朝多民族国家建立发展的重要性。^①但是，如下所述，它又走入另一个极端，否认汉人社会和文化对清代多民族帝国的贡献。新清史看似和汉化说针锋相对，实则同后者一样，都错误地使用了20世纪初兴起的汉族概念来理解和解释清代汉人的政治认同，忽略了二者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这二者的核心区别在于，前者特别强调血统的中心地位，后者则是以基于宗法伦理的王朝认同为中心。^②实际上，恰恰是王朝认同才使得清朝在面对占绝对人口、文化优势的汉人社会时，既可以维持自己的种族特性，又能赢得汉人社会对多民族帝国存在发展至关重要的支持。换句话说，在清朝多民族帝国的发展历程中，汉人社会的王朝认同不仅是清朝用于拉拢汉人精英的工具，而且是它的黏合剂。

时下的汉化论和新清史第二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就是双方都是静态地在满汉二分的框架下讨论问题，忽略二者本身都因为内在和外在的机缘，经历着新的变化，促成这种变化的机缘之一就是早期全球化的影响。对于清代中国和全球化的关系，西方的全球史和世界体系理论家们有两种对立

① 关于新清史对汉化说的批评和有关争论，详参 Evelyn S. Rawski, “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 4 (Nov., 1996), pp. 829–850. Ping-ti Ho, “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7, 1 (Feb., 1998), pp. 123–155. 关于这场争论，详参王成勉《没有交集的对话：论近年学术界对“满族汉化”之争议》，见《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国立”中正大学台湾人文社会研究中心，2006，第57~81页。

② 关于王朝认同，迄今最重要的论述之一仍然是姚大力先生的《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

的解释。一种是传统的西方中心观，认为在 19 世纪中叶前，中国自我隔绝于西方开始的全球化。^① 另一种观点兴起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贡德·弗兰克为代表的学者强调中国才是 19 世纪初叶之前世界经济的中心。^② 弗氏新理论问世后，特别是介绍到中国后，引起相当大的争论，褒扬者誉为历史性突破，而贬斥者则认为弗兰克夸大其词。

就笔者的浅见，造成这种争论的关键是对全球化缺乏历史的观察。全球化从其早期形态到今日的“地球村”，有一个漫长的、逐步发展的过程。15、16 世纪之交，哥伦布航海新大陆和绕过非洲通往亚洲航路的发现，从他们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把全球主要大陆联系到一起的角度看，可以作为全球化的开端。但是，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的全球化过程，与 19 世纪初叶，随着西欧工业革命而加速的全球化过程仍有相当的不同。区别之一就是，在 1800 年前的长达 300 年中，西方势力的踪影，尽管在全球范围内随处可见，但在美洲之外的许多地区，并不占据上风。相反，它是通过接受和遵循（尽管是勉强的）非西方社会的地方性游戏规则，才得以加入区域性贸易体系之中。^③ 因此，1500~1800 年的全球化进程是西方主导的和非西方主导的区域体系多元并存、相互整合的时代，与西方在 19 世纪以后席卷全球的、一家独尊的格局完全不同，这一阶段可以视为早期全球化时代。^④ 在这个阶段的经济、文化等领域，一方面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全球整合的展开，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日益密切。^⑤ 另一方面，这种整合仍然停留于初级阶段，世界上的许多地区仍然在这种整合之外。弗兰克和他

① 最具代表性的观点见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卷 1，第 43~47 页。

② 详参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中的有关讨论。

③ 在这方面最明显的事例就是在长崎的荷兰商人和在广州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人。尽管他们先后征服了今天的印尼和印度，但是，在处理对华和对日贸易上，他们仍然不得不接受清政府和德川幕府制定的游戏规则。关于长崎和广州的西方商人的最新研究，可参看白乐史（Leonard Blasse）的新著《看得见的商城：广州、长崎、巴达维额和美国人的来临》（*Visible Cities: Canton, Nagasaki, Batavia, and the Coming of the America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④ 约翰·德伟特（John DeWitt）在他的《早期全球化、美国和巴西经济发展》（*Early Globalization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azil*, Praeger Publishers Znc, 2002）一书中使用了“早期全球化”一词。不过，他的解释与笔者完全不同。有关德伟特的观点，详参氏著的引言和第七章。

⑤ 西方和新大陆对中国丝绸、瓷器、茶叶日益增长的需求和中国对美洲大陆白银的依赖是最好的例证。

的支持者一方面过于强调 1500 年之前和之后相当长时段的全球化程度，忽略了它与 1800 年之后全球化的不同，而难免有夸大之嫌。另外，它同所批评的西方中心论的全球体系论一样，仅集中于经济领域，却很少注意到全球化对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影响和冲击，因而低估了早期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① 而弗兰克理论的批评者，仅仅因注意到自然经济的存在，就否认全球整合的存在，实际上又陷入了另一种极端。本文认为，早期全球化和中国社会的互动，绝不仅限于白银的流动，它甚至成为影响盛清时代大一统话语重构不可忽略的因素。

一 让汉人的“大一统”回到清代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史中

在当下的清史学界，特别是在美国的清史研究中，“大一统”已经不太为人注意，原因自然与西方“新清史”研究对于汉化说的批评有关。随着对于汉人及其文化传统在清代多民族国家的建构角色的否定性重新评价，“大一统”这一汉人文化的政治理想，已经基本上为新清史建构的历史叙事所省略了。^② 但是，没有大一统话语，清朝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真是完整的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当重新检讨新清史和其所批评的汉化论迄今为止很少为人注意的某些理论预设，从新的视角让“汉人”和他们的大一统话语，重新回到这一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是要否定新清史的贡献，否定它所强调的非汉族群体对清代多民族国家建设的贡献，而是要通过重新分析汉化说和新清史理论都极少置喙的问题，为研究盛清时代大一统话语的重构提供新的理论出发点。

① 从沃勒斯坦到后来以《前欧洲霸权时代：1250 年到 1350 年的世界体系》（*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 D. 1250 - 135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Znc, 1991）而名世的珍妮·阿布卢古德（Janet Abu-Lughod），再到弗兰克等学者的有关世界体系的研究，都存在这个问题。弗兰克本人在《白银资本》（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第 451 ~ 452 页）一书中，就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说：“我在以前的著作中曾经提出过一个三条腿的凳子的比喻。这个全球整体同时依赖于生态/经济/技术一条腿，政治/军事力量一条腿，以及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一条腿。……《白银资本》的探讨也仅限于生态/经济/技术这条腿的经济部分，几乎没有提到另外两条腿，更谈不上在一个全球分析中把这三条腿结合起来。”

② 在新清史的几部代表作如欧立德的《满洲之道》、米华健的《西出阳关》、柯娇燕的《半明之鉴》中，几乎完全没有讨论汉人文化在清代多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先从汉化说谈起。新清史对汉化说有尖锐的批评，但仍然忽略了其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方面，非汉统治者并不只是汉文化的消极接受者，相反，他们会随时按照自己的需要重新解释汉人文化。另一方面，汉人在经历了非汉政权统治后，其文化观念、生活方式也会经历相应的改变。尽管作为文化先进的群体，它所经受的变化和冲击要小于那些相对落后的群体，用陈寅恪先生的话，就是一个胡化的过程。^①

具体到清朝，许多历史学者在讨论这段历史时，往往以清朝如何尊奉儒家文化取悦汉人及满洲国语骑射传统的衰落来证明汉化说之不误。但是，这种诠释忽略了一个很基本的问题，直到清朝灭亡前，满洲八旗无论怎样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它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方面与汉人的区别，仍然是鲜明可鉴的，是没有被汉化的。而且，清朝并不回避对汉人文化的重新解读，甚至将边疆地区的经纬度纳入汉人臣民日常不可缺少的时宪书中，^②对汉人中心观念（如中国）的满洲化诠释广而告之，要求汉人士绅认同接受。^③即便如此，满洲八旗的统治直到其灭亡之前，仍然得到众多汉人精英的支持。如果汉化是清朝成功的关键，这样一个直到灭亡都保持着诸多非汉特征的政权，如何会统治中国长达近三个世纪？再从汉人方面看，明代汉人的政治空间，如当时各种地理出版物所显示的那样，

① 对这个问题最早作出开创性研究的是陈寅恪先生。他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及《金明馆丛稿》初、二编所著的诸多论文中对胡化问题多有论述，如他从胡化的角度分析安史之乱后的河北地区藩镇割据问题，认为与“胡化深而汉化浅”有关，详参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26~27页。何炳棣在其前引反驳罗友枝的文章中，只强调陈氏的汉化论，难免有曲解之嫌。当然，20世纪90年代，张国刚先生在其《唐代藩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一书中，针对陈的解释，提出不同的看法。笔者以为，胡化的问题不仅存在于隋唐及以前，在元代以后同样存在。明代成化年间路经北京地区的朝鲜使臣崔溥就注意到，尽管元亡已经百年，但是，当地不少居民仍然着蒙古式样衣服，详参崔溥《飘海录》（葛振家校注，线装书局，2002，第162页），当然，蒙元对明代社会政治的影响或许不止于此。

② 详参本文第二部分。

③ 一个明显的事例是乾隆对中国观念的重新解释。他在《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文》里强调，“此乃汉唐宋明之中夏也，非谓我皇清之中夏也”。此碑文收入《皇朝文献通考》卷二八四，《舆地考》十六。按照他的指示，此碑广置于全国各地的学宫中，关于有关竖立此碑的过程及各地学宫分布，详参北京大学朱玉麒教授在《乾隆平定准噶尔全国立碑考》一文中对此问题的开创性详实研究。该文特承朱玉麒教授惠赠，谨此致谢。此外，满文的影响绝不限于满人，道光之时，汉臣习清语者仍不乏其人。如林则徐在京期间曾研习满文。详参《林则徐日记》（中华书局，1962），嘉庆十八年五月二十六、二十七日，七月十一日、三十日条。

仅限于内地。^①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后，汉人的中国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接受了清朝从多民族帝国角度对它的新解释。^②按照汉化说，这种变化也是无法解释的。

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清史显然注意到，清代多民族帝国的发展存在比汉化说的假设更复杂的历史内容。他们从汉族转向满洲，强调满洲认同的建构和发展对清朝多民族帝国建立的重要性。按照新清史的观点，清朝统治成功的关键在于满洲特性的维持，而满洲特性的延续又是通过建立满城，维护国语骑射，实行满汉隔离，赋予满洲政治、经济、文化特权来实现的。^③这种论述实质上是假定清代多民族帝国的建立和发展是在“去汉化”的背景下展开的。清代的旗人和汉人似乎处于一种井水不犯河水般的分离状态，而清朝统治者有意识地强化这种隔离，最终达到保持满人特性的目的。按照满洲中心观，汉人文化乃至其大一统话语，自然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因素。

但是，如果从清代满汉关系的实况来看，这种版本的满洲特性演变史，其实是相当错误的。清朝入关后，人口极少的满洲八旗除部分驻守边疆外，都分布于中国内地的广大地区，为人口占绝对优势的汉人所包围。而且，清代对边疆的战争和之后的管理，也是依赖汉地的经济资源和税赋收入支撑的。^④最重要的是，清朝统治者并不像新清史所强调的，把汉人文化与多民族国家的建构对立起来。一个最明显的事例就是乾隆年间西藏银币的汉文问题。乾隆平定廓尔喀入侵之后，决定在西藏铸造地方银币。最初的样本只有藏文，没有汉文。乾隆发现后，特地加以纠正，在有关谕旨中还特

① 明代后期到清朝初年的舆地出版物，按读者对象，可分为二类。一是专门著作，如王士性的《广志绎》，顾炎武的《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二是当时出版的各种地图，有关这些地图的内容，参李孝聪《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这些著作所记述的中国疆域范围都仅限于内地各省。

② 最典型的一例是龚自珍。他说：“四海之国无算，莫大于我大清。大清国，尧以来所传之中国也。东南临海，西北不临海，……今西极饶，至爱乌罕而止；北极饶，至乌梁海总管而止。”（龚自珍：《西域设行省议》，见《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第105页。）

③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近年来最重要的著作是欧立德的《满洲之道》。

④ 清代前期对新疆管理的经费主要来源是内地各省提供的协饷，详参米华健《西出阳关》第58~61页。另一事例是乾隆年间江南对新疆的丝绸供应。为了拉拢新疆地方势力，乾隆皇帝鼓励和准部、回部、哈萨克及中亚地区的丝绸贸易，所需丝绸均来自江南地区，详参林永匡、王熹《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1）。

意解释为何使用汉文：

但阅所进钱模，正面铸“乾隆通宝”四字，背面铸“宝藏”二字，俱用唐古忒字模印，并无汉字，与同文规制尚未为协。所铸银钱，其正面用汉字铸“乾隆宝藏”四字，背面用唐古忒字，亦铸“乾隆宝藏”四字，以昭同文而符体制。^①

他这里所强调的“体制”显然是清朝对西藏的行政管辖，这一材料非常清晰地说明乾隆并不认为汉人地区的文化与多民族帝国尽是相互冲突，相反，二者有时是相得益彰的。易言之，清代满洲性的建构，并不是完全如新清史倡导者所言，仅限于满洲内部及其与亚洲内陆的蒙藏文化传统的融合，而是与汉人精英有着密切的关系。没有汉人的清代多民族帝国建构史不仅是残缺不全的，而且是缺乏解释力的。

造成汉化说和新清史上述问题的症结何在呢？在笔者看来，就是双方都不加分析地使用20世纪初叶新出现的汉族概念去解释在此之前汉人的认同问题，而忽略了二者的区别。1900年以后，随着反满运动的崛起，一些汉人知识分子出于反对清朝统治的政治需要，借鉴从西方引入的民族主义思潮，提出以黄帝为始祖，有三千年历史的、以语言文化为基础的、排他性的汉族认同观念。^②此后，这一汉族概念就广泛流传开来。它不仅用于现代中国，还被用于清及以前的中国历史。汉化论者用此汉族概念解释清代历史，强调汉人文化的中心地位，从这一视角观察汉与非汉的文化互动，自然就得出非汉群体最终消融于汉文化的单向性变化的结论。新清史的观点，表面上与汉化说针锋相对，但如果细心推究其理论框架就会发现，它实质上是接受了汉化说对汉人社会的观点，把清代的汉人看作一个界限分明的同质排他性实体。但是，由于他们否认汉人的中心作用，就只有通过强调满洲认同来解释清代多民族国家的建构历史。前者过于注重汉人的贡献，后者则把汉人和多民族帝国对立起来，但二者却都忽略了如下问题：清季新出现的汉族概念是否与前此流行的汉人概念相同？后者果真如学者

^① 《乾隆实录》卷一四一八，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庚午条。

^② 详参孙隆基《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沈松桥《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7年第28期）。

假定的那样，是一个同质的排他性的认同对象？

其实，二者是相当不同的。如果套用费孝通先生形容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精妙比喻，前者是自为的存在，后者却是自在的存在。^①在这个问题上，清季立宪派和革命派似乎对此有更清楚的认识，尽管他们使用批评的口吻指出这一点。先看一段当时有关汉族认同的代表性论述：

汉人自称其践之汉土曰中国，实则地偏极东不可谓中，神器外移不可谓国。……以面积一百三十余万英方里之汉土，人口三百兆八千万有奇之汉人，不能自建一中央政府，以与各种族相颉颃，甘踣躄于狂签钐旱民族之轭下，其与犹太印度非洲诸人种复何以异耶？人民不能自主而受人之抑压。萧铿革马伛絆者谓之奴，土地不能自治而任人之治之，且变更不一者，谓之大陆，非所谓国也。非所谓有国之人民也。国者，终古不可灭之者也。然则四千年来之历史，虽谓为汉种未有国以前之历史可也。……今汉种为数之众，冠绝宇内所有各族；且所占有之地，亦既优于其他各种，惜涣散易溃，绝无团结不拔之精神，以致常为异族所屈。吁！安得一仲郭拉其人倡全汉人种统一主义，以陶铸我同胞独立不萧铿革马伛之精神焉。^②

这段议论，一言“四千年来之历史，虽谓为汉种未有国以前之历史可也”，二言“安得一仲郭拉其人倡全汉人种统一主义，以陶铸我同胞独立不萧铿革马伛之精神焉”，很清楚地说明在甘韩这样的汉族认同倡导者看来，汉族认同不是完成式，而是一个有待形成的认同。不过，持这种观点者还不止甘韩一人。章太炎为邹容《革命军》所著序中说：

今者风俗臭味少变更矣，然其痛心疾首、恳恳必以逐满为职志者，虑不数人。数人者，文墨议论，又往往务为蕴借，不欲以跳踉搏跃言

① 费孝通先生在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用这两个概念分析中华民族意识的形成，“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第1页）

② 甘韩：《说汉种》，见《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十八，民政。

之，虽余亦不免也。^①（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汤增璧说：

民族思潮，灌输中等以上，行商坐贾、老圃佣工、贩夫走卒之属，农氓、役隶之流，及于役戎幕、浮浪江湖、山泽联群、乡曲结社、市肆贾勇以为活者，凡诸品类，固有几人能识黍离之痛哉？^②（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也许有论者以为这是当时反清革命人士的偏颇之论，故作惊世骇俗之说，以吸引世人的注意力。不过，一种观点之所以能惊世骇俗，要有两个条件。首先，这一要让世人震惊的观点通常确实是很少被世人注意甚至忽略的；其次，倡导者要对此有准确的把握。没有这两个条件，任何以惊世为目标的观念传播都将难以达到宣讲者的预期目的。具体到光绪、宣统之际的1905年前后的汉族复兴论倡导者，他们中间的多数人都是在成年之后，才从认同清朝统治转向反满运动的。^③因此，他们上引有关汉人缺乏本族认识的观点，显然是建立在多年来亲身所见所闻的基础之上。这虽然不是现代人类学、社会学倡导的田野调查，但是，其感受的直接性和可靠性，显然是后来的历史学家们所可慕而不可求的，也是后者从各类文献档案乃至实物史料中所归纳得出的结论无法比拟的。就此而言，清末革命派人士对“汉族”民众中汉族认同感和归属感缺位的责难与愤懑，其实道出了一个迄今很少为人注意及研究的历史事实。

这就引出一个新的问题，如果“汉族”人群在清末之前并未有后人想象的汉族认同，那么，当如何解释历代公私文献中的“汉”“汉人”？限于篇幅，这里仅作一简要的概述。首先，在周秦时代，汉只是地理概念，指的是今天的汉水流域。^④到刘邦创建汉朝，汉就成为一个王朝的名称。这个“汉”的概念，并无种族含义。而所谓的汉人，首先指的是生活于两汉王朝

①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3，三联书店，1960，第87页。

②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1，三联书店，1960，第649页。

③ 如孙中山和章太炎都首先寄希望在清朝体制内的改良，只是在清朝失望之后，才转向反满民族革命。

④ 如《诗经·汉广》中的“汉”，即指今天的汉水流域。

或时代的人，这在历代史书中不胜枚举。^①

首先赋予汉人概念以种族含义的是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群。他们中的许多部落生活于汉朝边境地区，因而称汉朝直接统治下的民众为汉人。在与内地民众的交往、冲突过程中，他们逐步发现自己与内地民众在语言、风俗、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他们所使用的汉人，不只代表特定的政治实体，还指代一个具有不同语言文化传统及生活习惯的群体。^② 汉朝灭亡后，当时以及此后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群继续使用汉人的概念，指称居住于中国内地的民众。这时的汉，主要是指与少数民族文化、政治传统存在差异的内地人群，其内涵已经接近 20 世纪出现的“汉族”的观念。^③

不过，非汉族群使用“汉人”指称还有其特殊的用意。首先，少数民族群进入中原后，在寻求“汉族”精英支持的同时，为维护自身的内在文化、政治凝聚力，需要通过制造汉人这样一个“他者”来凸显自身的文化认同。策略之一就是强调他们心目中汉人的缺陷来反衬出自身的优势。如以汉人的“文”反衬非汉族群的“质”，以汉人士大夫的“醉心文辞”来反衬非汉精英的“精通骑射”，通过界定何谓汉人来提醒本群体成员的核心认同所在。^④ 在这个过程中，“汉人”就不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被赋予种族内涵，代指一个文化、语言、生活特点不同于其他人群的族群。

与非汉统治者热衷于使用“汉人”指称他们治下的汉人群体不同，汉人精英对作为种族概念的“汉人”的态度却是耐人寻味的。一方面，汉人士大夫采用这个概念指称自己族群的成员，特别是在处理那些涉及汉人与

① 本文限于篇幅，仅略举数例。如朱熹《朱子语类》中多处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汉人”一词，如卷七八，“尚书传是后来人做，非汉人文章，解得不成文字”；卷七九，“汉人亦不见今文尚书”；卷八十，“汉人避讳，改作‘严’字”。

② 如《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

③ 这里仅略举数例，《北齐书》卷二十一，《高乾传》第十三，“高祖曰：‘高都督纯将汉儿，恐不济事，今当割鲜卑兵千余人共相杂。’”《北史》卷二十八《源贺传》：“阿那肱忿然作色曰：‘汉儿多事，强知星宿。’”《金史》卷八《世宗本纪》：“又闻有女直人诉事，以女直语问之，汉人诉事，汉语问之。”《老乞大谚解》：“你说我听著，如今朝廷一统天下，世间用著的是汉儿言语，我这高丽言语，只是高丽地面里行的。”

④ 如金世宗认为，“（女真）幼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真真实之风。”（《金史》卷七《世宗本纪》）乾隆皇帝直斥满人“竟染汉人习气，有失满洲旧风。”（《乾隆实录》卷六九五，乾隆二十八年九月甲戌条）

非汉族群的纠葛时，作为族群的“汉人”的概念更是被大量使用。^①但是，就笔者近年来反复查检宋元和明清之际的原始文献看，当汉人士大夫（如宋末和明末的士大夫）因外族入侵或征服而需强调自身的认同感时，却极少像清末革命党人一样，明确而直截了当地高举“汉”认同的旗帜。在清末革命党以前的文献中，类似他们在种族意义上“大汉之天声”或“光汉”之类的表述，几乎是不存在的。^②而且，如果稍微细致地体会他们论著中的“汉人”和“中夏”、“华”的用法，就不难发现，他们在使用“汉人”一词时的心态是平和中立乃至冷漠的，给人的感觉是他们讨论的似乎不是与自己同属一个族群的人群。^③相反，当他们谈及王朝认同时，其语态情绪是激越热情的，这种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样体现于他们对已故王朝的眷恋和忠诚上。明遗民顾炎武可谓这方面的典型。他在60岁时曾著一联，吐露对故明的忠贞之意：“六十年前二圣升遐之岁，三千里外孤忠未死之人。”^④但是，通观顾炎武的《日知录》，尽管常在种族意义上使用汉的概念^⑤，但对之绝未有如此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而且，顾认为，决定人民产生认同感的关键是良好、有效、便民的政治制度。有了这种制度，夷狄政权照样可以得到汉人的认同。他以理解的态度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北魏汉人和宋代幽云诸州汉人何以认同非汉统治：

前者如魏太武始制反逆、杀人、奸盗之法，号令明白，政事清简，无系讯连逮之烦。百姓安之。宋余靖言，燕蓟之地，陷入契丹且百年，而民亡南顾心者，以契丹之法简易。盐麦俱贱，科役不烦故也。是则

① 《皇明经世文编》卷一一五，杨一清《为修复茶马旧制，以抚取番夷安靖地方事疏》：“但有汉人结交夷人、互相买卖。”卷一七三，徐问《修举武备以无忘不虞疏》：“一防制达官以需调用。直隶、保定等卫分，俱有达官舍目。其骁勇悍强，状貌气习，与汉人不同，所谓非我族类未敢保其不异。”类似用法，在该书和其他汉人著作中可以找到无数例证，限于篇幅，这里仅列举一二。

② 一个明显的例证是明太祖的《谕中原檄》（《皇明文衡》卷一）。该文一方面批评元朝为“胡虏”，另一方面，又认为元朝代宋，并非“人力”，“实乃天授”。此外，元明之际，江南汉人精英中存在的思元意识（详参钱穆《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6册）也证明汉认同的缺乏。

③ 仔细体会一下前引《皇明经世文编》和下面引用顾炎武的材料，都不难感到这一点。

④ 《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第142页。

⑤ 顾炎武的《日知录》在两种意义上使用“汉人（民）”一词，一是指汉代之人，二是指种族意义上的汉人。